

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

邱 昶 黄 昕

(湖南人民出版社资料室)

只要没有偏见和不是别有用心,谁都会承认如下铁一般的事实——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复苏、更新和迅速发展,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喜人局面:图书馆学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1979年,为了迎接全国图书馆学会的成立和第一次图书馆学科学讨论会的召开,全国各地撰写了近一千篇论文。据公开报道的资料统计,1980年全国和各地图书馆学会(或组织)举行图书馆学科学讨论会的有26个,其中有18个共收到论文1387篇。1981年,据对30个图书馆学刊物的粗略统计,仅上半年就大约发表论文一千二百多篇。至目前为止,全国共有省(市)以上的图书馆学刊物约35个。图书馆学论文不仅数量逐年增多,质量也逐步有所提高,图书馆学传统性的“禁区”正在不断被突破,其研究的触角已深入到传统图书馆学范畴以外的情报学、文献学、档案学、科学学、未来学以及物理学、电子学、应用技术等学科和领域;每年全国各地出现的数以千计的图书馆学论文,无论对目前传统的图书馆工作和技术,还是对正在进行的图书馆现代化建设,都有着积极的一定的指导意义;伴随着图书馆学研究的蓬勃兴起,一支以中壮年图书馆员为骨干、包括老一辈图书馆学专家和青年图书管理员的图书馆学研究队伍正在日益壮大,我国图书馆界充满了学术气氛和科研活力。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理想的境界?新时期的图

书馆学研究,在对待历史与现实、传统手法与现代化手段、坐而论道与解决实际等等问题上,是不是已经完美处之而“无懈可击”呢?

答案是否定的。

科学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活动,“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①。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图书馆学研究的现状及今后开展的路向阐述一管之见,就教于图书馆界专家和同仁。

一

图书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源远流长,在我国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用现代的眼光看,它发展十分迅速,虽然从开始使用“图书馆学”这一学科名称距今只不过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其带根本性的变革和进步却令人目不暇接。然而,不管古老也好,年轻也好,只是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时间概念,不能概括它在某一方面的特性。尽管如此,透过图书馆学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脚印,我们却十分清楚地看到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及整个图书馆工作之间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可以这样说:在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留在文化、科学史册的印记上,都有着图书馆学的“拓本”。而在近代特别是现代,图书馆学已由机械、直观的“拓本”,一跃而成为能动、高深的“经典”了。就是说:图书馆学已经不仅是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规律的一般概括和总结,在日新月异的今天,还应该是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沿着现代化轨

道迅猛推进的指南。

四十四年前，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

“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图书馆学的对象，就是图书、图书馆和读者诸要素构成的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工作。显而易见，图书馆学研究的现状好与差、水平高与低，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可以起到反证的作用。那么，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现状和水平究竟怎么样呢？在回答作出以前，让我们先看看世界，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国情。

本世纪五十年代，电子工业技术不断进步，向生产、科学甚至生活各方面渗透。据报道，世界各国图书馆实现自动化计划的已经超过二万个，今后将会不断增多。在此基础上，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国内以至世界性的现代化图书馆网，进行国内外协作，实现国际资源共享。

在国内，经过十年浩劫，素以拥有四千年文化遗产为荣的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得不承认：我们落后了！而每当各项事业大上时排在最后面、当“下马”风一来却又首当其冲被砍掉的图书馆，与先进国家比较，被拉下了更大的距离。按下“现代化”话题不表，多年来左倾错误路线给图书馆造成的不良后果，又使我国图书馆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

那么，以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是否正视了这一现实呢？是否无所畏惧而又实事求是地剖析图书馆界所共同关心的种种社会问题呢？是否把解决同行们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疑难作为己任呢？又是否为无限美好、动人的图书馆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上描绘出宏伟的蓝图呢？很遗憾，恰恰在这些“实打实”的问题上，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却显得软弱，涣散，收效甚微——或者叫做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缺陷，其主要表现如下：

1、研究选题偏离现实。

这是图书馆学研究缺陷的主要症结所在。长期以来，图书馆学的研究机构和个人很少或根本没有同国家决策机关和实际工作部门发生联系，科研选题与实际工作扣得不紧，论文的时代感不强，从而使得教学、科研实际上成了一种一般的社会职业也即谋生的手段，而不必具体担当社会责任，使得研究人员（当然大部分是在职的图书馆员）在选题、取材、撰写论文的时候，乃至论文发表以后，也很少或甚至就没有考虑过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社会效果。结果是，历史变化了，社会前进了，科学发展了，问题产生了，也很难引起强烈的科研欲望，在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无动于衷，在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面前因循守旧，争着搞“与世无争”的常规课题，习惯于空来空去的坐而论道，不痛不痒，四平八稳，甲乙丙丁，人云亦云，科学的内在精神被大量公式化、机械化、简单化的东西所代替。由于图书馆学偏离了自己生动活泼的对象，当然也就失去了力量。

比如“现代化”这个主题，在目前，它成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在科技战线，它成为科学家们攻坚的制高点，在文艺界，它又成为文艺工作者所追逐的热门题材。可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对它的反映却颇为冷淡，近期虽有《计算机与图书馆》这样的专业性杂志面世，有关现代化图书馆的文章、译介也零星散见于各地报刊，但毕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给予“着重点”的一席。1979年在全国图书馆学会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三史”（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方面的论文有二、三十篇，占全部论文的五分之一左右，有人曾津津乐道过。我们想，如果也有五分之一的比例探讨现代化的内容，该有多好！

再如，放弃对活生生的社会问题和实际工作的探讨，而热衷于打空来空去、无的放矢的笔墨官司，把聪明才智完全投资于引经

据典、咬文嚼字的学究式的论争之中,如对“什么是图书馆学”的论战就是一例。这场论战,始于1958年,时至今日已有二十三年了,不仅毫无偃旗息鼓之意,反而大有“重整旗鼓”之势。争来论去,无一结果,却越发令人如坠烟雾之中。笔者确实不明白为图给图书馆学“固定”一定义而兴师动众,混战二十多年的优越性何在?如果把这二十多年的时间,投入这么多的人才智力,用来研究切合实际的其他课题,该有多大的收获啊!笔者并不反对给“图书馆学”以恰如其份的定义和评价,更不反对富有意义和卓有成效的百家争鸣。事实上,刘国钧先生1957年《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在当时还是比较准确地阐明了这个问题的。如果说过去的论战或对刘先生的批判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战斗的话,那么在历史以崭新的面貌跨进新时期的今天,这样的论争就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毫无意义的了。纵观各家争论的要点,分析诸多“分歧”的字句(有人统计过共有十余种不同的观点),如果去掉“社会主义”、“现代”等等限制词,必须老实承认,笔者的确看不出争鸣的百家原则性的分野何在。

2、研究方法简单划一。

图书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与研究方法的优劣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能设想,低劣的研究方法会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太少,简单划一。过去,我们受苏联那一套规范的影响较大,比较保守和单调。现在,一些研究人员又不大注意研究方法的改进,特别不重视吸收自然科学,首先是数学的新成就为我所用。这样,对于大量出现的图书馆的实际问题,许多人就只能停留在定性分析上,无法进行定量的研究。简单划一的研究方法,必然产生水平不高的科研成果。很多论文枯燥无味,有些平平淡淡,可有可无,甚至还有相当部分重复他人的劳动或拼凑得来,究其原因,除研究的目的性不明确外,单一的研究方法

是产生研究次品或废品的重要因素。

3、研究队伍亟需提高。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虽然有了一支人数颇为可观的队伍,但从其素质来讲,还是不够理想的,严格地说,其中的大多数还担负不了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工作。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对图书馆学的冲击,造成图书馆学的分支和边缘学科越来越多,有关的科学技术领域不断涌现,因而多数图书馆员的知识面相对地显得越来越窄,他们对新生学科、相关学科知之甚少。这样,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一接触到实践性、技术性强的课题,就显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实际上就等于削弱了图书馆学的力量。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图书馆学研究的落后状态,直接影响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严峻的现实雄辩地说明:为了更好地充分地发挥图书馆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加速图书馆现代化建设,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到了需要认真改革、并获得新的发展和进步的时候了。

二

当今世界,围绕着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许多年来,在西方科学哲学领域中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当代科学学的创始人、著名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贝尔纳认为:科学是一种建制,科学是一种方法,科学是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科学是一种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科学是构成宇宙观的一种强大力量^②。而英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证伪主义代表卡尔·波普尔则认为:科学的本质就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犹如“探照灯”,它总是把探索的光柱投向遥远的未知国土。科学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是任何形式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③。波普尔在晚年为了总结性地阐明这一观点,还把他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作,凝缩成一个“四段图式”,这个图式是波普尔的科学方法新理论的最新结晶和典型形式:

P1→TT→EE→P2

其中P1是问题, TT是尝试性的理论, EE是通过检验消除错误, P2是提出新问题。这个图式表示! 科学开始于问题又终结于问题:

问题1→尝试性的理论→通过检验
消除错误→提出新问题

与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美国科学家托·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不断地批判和革命的过程, 都十分强调“问题”在科学理论变更中的地位和作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的图式是:

前科学→常态科学(形成规范)→危机
→革命(形成新的规范)→新的常态科学→
.....

如果按照这样的图式, 很明显, 我国图书馆学正处在“危机”和“革命”阶段的交接处。图书馆学要想获得新的发展和进步, 就得克服“危机”, 进行“革命”。而在“革命的前夕”, 首要的是必须有明确的出发点, 即科学目标, 选择好科学研究的突破口。

出发点问题, 对一切科学学科来说, 都是属于基础性的问题, 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背离了正确的出发点, 科学劳动就会丧失其崇高的价值, 甚至陷入歧途。科学和谬误往往是由此分手而通向各自的彼岸的。换言之, 社会科学只有时时注意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发展, 把认识的新水平和获得的新知识作为自己的新起点, 无所畏惧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 才能永葆科学的青春, 造就自身的发展。正如不久前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所说的那样: 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要引起人们的追求, 引起人们的喜爱, 引起人们的支持和赞助, 首先必须使这门科学同人们的生活, 同实际, 同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否则, 它就必然要走向萎缩和僵化, 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爱因斯坦在

谈到科学目标的重要性的时候, 指出: “只要存在着这些目标, 科学方法就是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科学方法本身不会引我们到那里去的, 要是没有追求清晰理解的热忱, 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科学方法”^④。他从自己切身的科学实践活动中体会到, 一个科学家要象虔诚的宗教徒建立自己深挚的宗教感情, 或者是青年人谈恋爱的热烈感情那样, 来建立自己的科学目标和科学信念。要是没有这种热忱, 就很难在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成就。我们搞图书馆学研究的同志, 不正是需要这样高度的事业心和顽强的科学信念吗? 我们选择怎样的出发点, 以什么选题作为突破口, 不仅是对科研水平和能力的考核, 同时也是对自己的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检验。

科学需要正确的出发点, 而正确的出发点必须建立在为人类谋利益上面。在今天, 我国图书馆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就应该为四化建设服务, 具体点说, 就是为尽快促进我国图书馆的现代化、更充分地发挥它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服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 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住选题的社会价值。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 出发点本身就包含着价值。这个价值, 是由它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决定的。一般地说, 层次水平越高价值就越大, 反之则反是。而价值量的大小则决定于科研选题本身的尖锐性、现实性和广泛性。所以, 我们图书馆学研究, 必须在这“三性”上大做文章。

科研选题的尖锐性, 主要是指选题对社会常规状态的冲击程度。目前, 我们有些研究人员缺乏胆识和气魄, 害怕选择尖锐性的课题, 竭力迴避科学劳动上的风险, 总喜欢选择那些与世无争, 甚至冷门生僻、无人问津的题目。这样, 他们的研究虽然也能给自己带来某些好处, 但对于社会的进步、图书

馆学的发展却是可有可无的。当然,我们对传统和习惯的冲击,并不是要去否定传统和习惯中正确的东西,如我国的目录学、版本学等就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遗产。我们所要开刀的对象,只是传统习惯以及社会上落后的、保守的和科学的成份,使其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造福。必须指出的是,平淡无奇、人云亦云的东西固然不会产生尖锐的社会作用,而毫无意义、脱离实际的标新立异、危言耸听也同样不会起到这种作用的。我们的结论是:新时期图书馆学最尖锐的课题就是那些敢于对抗旧的传统和习惯,敢于和正在进行中的不代表发展和进步方向的事物相抗衡的研究。

围绕着“我国图书馆事业比起先进国家来还是十分落后的”这一命题,三十多年来,应该说我们还没有进行认真、严肃、有的放矢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生活、学习、工作和科学研究,习惯于对任何形势的估计都是运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例关系,习惯于“在革命路线的光辉指引下”诸如此类的固定的语言模式。对旧的传统和习惯势力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见。习惯于大做“绝对正确”、“不偏不倚”的官样文章。近年来,虽然已经开始有涉足这一命题的文章出现,这当然是十分可喜的,但数量毕竟太少。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却是根本回避不了的。否则,哪怕你有再好的愿望、再大的决心、再美的蓝图,也将一事无成。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艰巨而要担当风险的科研任务。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者,有作为的图书馆员,应该挺身而出,遵循四项基本原则,以革命导师特别是列宁关于图书馆的一系列论述为指南,实事求是地探讨我国图书馆事业落后的表现、原因、危害和产生的根源,写出一批无愧于新时期图书馆事业的高水平的论文来。

科研选题的现实性,主要是从实用角度考虑的。科学并不创造目的,但科学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实际的目标提供手段。从广义上讲,科学的天职在于探求未知,一切未被认识的东西都应该是它的对象。但是,就其现实意义上说,科研选题还是有其轻重缓急的,现实性最强的问题,无一例外是人们最关心和迫切希望解决的实际问题。对于图书馆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党工作者重点的转移,整个社会和图书馆界最关心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是实现图书馆现代化的问题。

国外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和国际性的数据资料处理中心的建立,促使我国用以组织全国图书馆网,指导馆际互借,调度图书资料,传递知识信息、检索中心的研制,给图书馆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

为适应现代化图书馆的科学管理,对基础业务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图书馆干部的专业化以及图书馆组织的网络化等的研究,对相关科学如图书馆建筑、图书馆统计和读者心理的研究以及对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和方志学的更高水平的研究等等,都向图书馆学研究提出了更多的新课题。

不断出现的新科学、新技术,也将不断扩大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

凡此种种,说明当前图书馆学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图书馆学提出了更多、更新、更深,更广的科研课题。各方面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国现有的图书馆学研究急待提高和发展;图书馆现代化的实现,除图书馆界和其它各界的共同努力外,特别有待于图书馆学理论的指导。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千百次地验证了这个事实:理论上的任何突破,都将会给实践工作带来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

科研选题的广泛性,是指选题本身具有的普遍意义。科研选题作为科学的入口,愈具有广泛性,其社会作用就愈大、愈强烈,

因为科学活动的意义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横向和纵向的完整统一。我们只有把握住“广泛”这个基本目标,才会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目前,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有几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应用研究十分薄弱,不仅人力物力投入少,而且大量的基础研究成果长期无法应用;二是在现实问题研究上所投力量过少,过多的致力于历史的研究,造成重点上的本末倒置;三是对外国问题的研究有一定盲目性。因此,要求科研选题具有广泛性和针对性,就必须掌握以下原则: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上,应以应用研究为主;在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研究上,应以现实问题为主;在外国问题与中国问题研究上,应以中国问题为主。我们的各级图书馆学会、高等院校图书馆学专业和各类型的图书馆,在今后的科研选题上,在科研投资和人力布局上,都应该权衡主次而好自为之。

三

科学不仅需要正确的出发点,而且需要先进的具体方法。毛泽东曾经把科学方法比作过河用的船和桥,可见科学方法对于科研活动的重要作用。当前,对于图书馆学研究来说,吸收先进的科学方法,造就一支新型的科研队伍,乃是实现图书馆学研究目标的重要保证。

诚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方法论历史上各种杰出思想进一步科学化的结果,其基本内容在当代仍然具有强烈的真理性。社会科学只有紧紧依据这个方法论及其体系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情况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科学整体面貌的根本改变,使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这两大科学部类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触及了许多学科的专门方法,也引起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结构和构成上的新变化。

马克思指出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化的受历史制约的暂时性,并说将来“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概括了当时自然科学社会实践的最新成果,而费尔巴哈之所以不能跳出旧唯物主义的巢穴,则是因为他对自然科学的孤陋寡闻和与社会实践的脱离^⑤。列宁说过:“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纪,这个潮流也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强大了”^⑥。他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曾经提出要实现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认为这是在自然科学经历急剧变革的时代,使战斗唯物主义既有战斗性,又是唯物主义的根本途径。列宁讲的这些,当然也适应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

为了繁荣和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首先,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打破图书馆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有形和无形的壁垒,提倡向自然科学学习。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自然科学已经渗透到图书馆学内部,极大地影响着图书馆学的发展。图书馆学已经不是一门孤立的科学,而是一门实践性、技术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正因为现代图书馆必须利用以下科学技术的成果:哲学、数学、语言学、数理语言学、信息论、概率论、控制论、系统工程、计算机科学、电讯技术、逻辑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缩微技术、复印技术、录像与磁盘技术、光电技术、贮存技术等,因此,图书馆学研究必须突破原有传统和简单划一的方法,向新生的自然科学领域进军,从先进的科学方法中吸收富有生命力的代表发展方向的养份为我所用。马克思曾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

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所以,只有吸收当代科学的新成果和新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的立足点随着当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才能使图书馆学研究不断深入。

目前,对图书馆学研究影响最大、最值得我们图书馆界认真研究的新科学方法有结构——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等,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数学方法。

数学是科学技术的皇后,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基石。在现代科学当中,任何科学研究对象不仅具有质的规定性,同时也具有量的规定性。因此,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不仅要用定性的方法去考察研究,而且还要用定量的方法去进行精确的分析。这种定量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运用数学方法。恩格斯说:“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②。在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物质状态及其运动形式,都具有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因此,任何一门科学,不与数学发生联系,不借助于数学方法,就不可能更好地刻划出事物的运动规律,也不可能达到精确科学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③。

数学方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①收集、整理、分析、管理有关数据和资料,也就是基本数据的统计和运算,如藏书量、读者人数、借阅人次、册次、图书周转率、流通率的计算等;②对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工作中数量之间的相对稳定关系,用数学公式加以描述,即建立一些数学模型,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图书馆工作的规律;③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处理浩瀚的文献资料提供了物质手段。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已有人试着用数学公式描述图书馆的经济效果,运用集合论处理文献检索,还有人提出对图书馆的经费开支、藏书增长率和书库空间的关系利用数学公式来表示等等,都是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图书馆学研究的可喜开端。

必须指出的是,结构——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和数学方法,毕竟只是具体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体系中的新成分,对图书馆学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大的。可是对图书馆学整体来说,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方法论主体。如果把这些具体方法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甚至以此代替方法论或者完全排斥掉传统方法,则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危害。比如图书馆借阅工作中的数学方法,如果离开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党对图书馆工作的指示和图书馆本身的性质、方针、任务,单靠数学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而且很容易走到斜路上去。总之,我们强调接受新方法,是为了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作用,推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沿着健康的现代化的新轨道向前发展,而决不是其他。

其次,为了保证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向高水准进军,还必须逐步造就一支新型的科研队伍。

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队伍,从每年产生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来估量,规模是比较大的。但究竟有多大一支队伍?有多少卓有成就的专家和研究工作者?我们想即使是全国权威性机构中国图书馆学会,也难以说出一个比较准确、肯定的数字来。如上所述,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还是比较落后的,而造成这种落后状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队伍的缺陷。这个缺陷,有自身素质方面的问题,有培养方面的问题,也有来自社会的原因和阻碍。为了提高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水平等级,尽快造就一支新型的科研队伍,实在是迫在眉睫的一项紧急任务。

怎样造就我国新型的图书馆学研究队伍呢?我们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

①从“科盲”扫起。我们大多数研究工作者,在本学科、本专业上的造诣是不待言的。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基础的科技知识,对与图书馆学关系密切的其他学科,却知之甚少、一知半解或根本就是“科

盲”。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如果一个图书馆学研究者是“科盲”，那他就很难理解社会历史、特别是现代社会的进程，更不用说从理论上给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以科学的、规律的说明了。因此，我们必须牢记恩格斯的这段话：“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⑩。我们必须把研究工作建立在新知识的基础上。新知识除接触社会，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所得之外，就是接触自然科学，向自然科学学习，从中吸取新的知识。这是使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摆脱当前落后、贫困的状况，获得繁荣与发展，并且造就一代新的图书馆学专家的一个重要途径。

②从基础抓起。任何时期、科学上拔尖、卓有建树的人物，都是在广泛的群众性的科研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现代更是这样。图书馆学要想获得更大更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扎实而且逐步向高水平挺进的群众基础。因此，抓好基础工作十分重要。这里说的“基础工作”，是指对在职图书馆工作者或初入图书馆学研究之门的同志的提高和在校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培养工作。抓图书馆工作者的提高，除自己加强自学外，还要靠老一辈专家和有经验的研究人员或老馆员“传帮带”。老同志应在从事科研的同时，为他们编写诸如“图书馆学基础知识”、“现代化图书馆ABC”、“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入门”一类的“图谱”读物，并在具备一定程度的基础上，鼓励和辅导他们进行图书馆学研究。至于图书馆学的教育，则主要是改变过去单纯从文科招生的培养方向，开设科技文献检索、文献复制、电子计算机原理、图书馆自动化等新课程，为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工作源源不断地输送新型的专业人材。

③从人才用起。图书馆不仅是根植、造就专家、学者、名流、新星的土地，而且也是藏龙卧虎、人才荟萃之地。但由于长期以

来社会的偏见和本身的种种原因，致使众多的“龙虎”未能奔跃，闪光的人才无法施展，这块肥沃、优质、高产的处女地一直没有被认真、有效地开垦过。政治理论界、科学教育界、文学艺术界，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新星，他们所致力项目光芒夺目，活跃、丰富和促进了本学科、本专业的繁荣和发展。相形之下，我们的图书馆学显得多么黯然失色！解放前过来的老专家如今已寥寥无几，中年专家急需扫“科盲”和补课，而青年研究者却在“堂堂正正”地重蹈“师承前人、依法炮制”的旧辙。这几年，我国图书馆界虽也涌现出一批新人，但缺乏对他们应有的培养和提高。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一直处于比较落后、无足轻重的状态，很多研究人员信心不足，劲头不高，目标不大，不少专业人员心猿意马，宁可放弃所学的本行而希望在其他学科大显身手、有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图书馆的人才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发现、培养和大胆使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为此，我们寄厚望于中国图书馆学会、各地图书馆学会和各类、各级图书馆，把开发图书馆的人才资源当作当前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抓紧做好，为造就一支宏大的高质量的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工作队伍争作贡献。我们郑重呼吁：图书馆界的同仁，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允许甚至鼓励有志者成名成家，有所建树；要允许他们有所突破并帮助他们克服在突破的过程中可能犯下的过失或错误；要充分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时间、人力、财力和资料，为他们到达一定的高度扫平道路；要不拘一格发现、培养、提高和使用涌现出来的新秀，并主动、积极向全国图书馆界及整个社会推荐。各个图书馆培养的人才越多越光荣，也应该越得到全国图书馆界的赞许。“育树先育人”，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应作出与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相称的贡献。

关于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情报工作

彭修义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现在,人类知识已被称作第二资源,开发第二资源的口号已响亮地提出来了。人类知识的实质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作第二资源?开发第二资源对人类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它对我们图书馆学界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起码应当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加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第二,如何改革图书馆学情报学现行体制,以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和这场战斗的需要。本文就从这两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知识与信息

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列宁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通过人的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28页)因为物质具有能量和信息,物质的信息通过能量到达我们的感觉,我们才能感知。因此,信息既离不开物质而存在,也离不开能量来传递。

什么是信息?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信息概念。一种是通讯科学即信息论中的信息

概念,它将信息和消息区别开来,在消息中含有可计量的信息。一种是物质、能量、信息中的信息概念,这种信息带来能够为我们的感觉所感知的物质的消息,本文取这一信息概念。所谓信息,就是物质形态借助于能量所带给我们的标志物质客观存在的一种消息,这种信息能够为我们的感觉所感知,为我们的大脑所翻译。目前我们所能接收和翻译的信息却是物质总信息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就是这极微小的一部分信息,却是提供我们知识的物质来源,构成我们知识的具体内容。所以,人类知识,就其实质来说,是为我们的感官(包括各种人造器官——仪器)所感知并为我们的大脑所翻译的物质信息。客观世界的物质信息与物质、能量是不同的,它直接服务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的现实的资源。而物质信息,我们却不能直接利用它,要利用这种信息,需要一定的转化,这就是要通过大脑将其转化为知识。知识作为一种人工信息,它来源于客观世界的物质信息,反映着人所认识的客观物质世界。这种人工信息——知识,可以直接为人类使用,人类根据自己对自然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就可以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光辉的物质文明。所以,知识可以毫无愧色地以信息

附注

- ① 《历史上的科学》导言,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 ② 《历史上的科学》导言,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 ③ Karl R·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xford, 1972.

- ④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97页。
- ⑤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⑥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
-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8页。
-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411页。
-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42页。
-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382页。